

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峡谷至下游底杭河 名称的由来及历史地理考察

房建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北京 100006)

[关键词] 中国 西藏 雅鲁藏布江

[内容提要] 本文从不同角度对中国西藏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峡谷及下游底杭河名称的由来做了历史地理方面的考察,对学术界关于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峡谷及下游底杭河名称的由来的某些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中图分类号] K928.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800(2000)04-0030-14

A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Examination of the Big Bend or Gorges of the Yaluzangbu River along with the Names come from of the Lower Reaches of Dihang River

Fang Jianchang

(Centre for China'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ies, CASS, Beijing 10006, China)

Key words China Tibet Yaluzangbu River

Abstract The author approaches a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examination of the Big Bend or gorges of the Yaluzangbu river along with the names come from of the lower reaches of Dihang river from a different voice against some view points on the Big Bend or gorges of the Yaluzangbu river along with the names come from of the lower reaches of Dihang river in the academic circle.

叙述的范围和时限: 对于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峡谷及下游底杭河名称的由来及历史地理方面的考察,涉及到这段中印边界史,按照前人的研究及实际地理情况,我们这里主要讨论 1840—1949 年间的历史,对此前或此后的史事亦作必要的叙述。

史料: 1、藏文: 有关这一课题的藏文史料虽然不多,但在论证历史事件及比勘地名时却是至关重要的。2、汉文: 清代有关的汉文史料光绪以前还比较零散,但而后渐丰,近人

[收稿日期] 2000-10-27

[作者简介] 房建昌(1955—),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边界史西藏段的研究。

的研究成果就更多了,足资借鉴;不过,应当指出的是:自1960年中印边界谈判之后,大陆及港台学者虽发表和刊布了许多有关中印东段边界问题的论著(主要言近代、特别是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下简称“麦线”〕的由来),但大致是讲整体归属及“麦线”的非法性,鲜有利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依据中外史料讨论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峡谷及下游底杭河名称的由来的。我国唯一认真地研究西藏地名的有武振华先生,但他在《世界最大峡谷应命名——“雅鲁藏布江峡”》(另见《中国西藏》1998年3期同名简写一文)一文中虽使用了一些史料,作了在当时国内已属较详细的论述。但未能使用藏文、特别是藏语地名原音;由于本身条件的限制,一些重要的有关汉藏及外文史料亦未使用。故限制了他的成就。如此文言:雅鲁是藏语的区域性地名;藏布系藏语江的意思。但乾隆朝《钦定西域同文志》明确记载:“‘雅’(Yar)是‘大’的意思,‘鲁’(gLung)是‘江’,即‘水大而远’。‘藏布’(gTsang-po)是‘清静无垢’之意。”实际上,笔者见过许多过去的藏文文献,可以发现,雅鲁藏布江做为西藏整条江的通称,是民国以来汉文文献的说法;在藏文中该江进入卫藏地区后通称为“藏布(gTsang-po)”。而《世界第一大峡谷谁属——地貌学家杨逸畴教授答记者问》谈了70年代以来他们三位科学家对该峡谷的自然科学方面的考察,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康熙以来,在华的西方耶稣会士在绘制地图时就为雅鲁藏布江是否为布拉马普特拉河的上游而苦恼,近代以来,英印当局已秘密派人去大拐弯处考察,进入民国,由于英印军队的从下游入侵,得以派出专门的测绘人员逆流而上,对大拐弯处做了考察,如阿波尔讨伐队的测绘人员1912年实测了南迦巴瓦峰的经纬度和高度,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不久有贝利等的考察,又有花德金的《藏布诸峡谷之谜》等专书。其它文献很多,特别是大拐弯下即为“麦线”,一直在英印方面的控制中,非当地的中国学者不仅在过去,在今天也无法进行考察,只能借助英印方面的大量考察资料,而杨教授等学者似乎注意不多。至于科学探险家协会的《世界最大峡谷及其命名》(该会杨逸畴、高登义、李渤生、陶宝祥四人署名,1998年6月22日)一文,按照一般的说法,谈到雅鲁藏布江工部藏布以下称做底项(Dihang),并言不知来源。实际上,Dihang虽为最常用,但在1911-1913年的英印阿波尔讨伐探险队的有的权威性的报告中写做Dihong。而Dihang在1960年中印边界谈判中被译做德亨河;尽管我方只用雅鲁藏布江,但在译印方的Dihang时就如此汉译。1911-1912年多次从底项河逆流北上的英印阿波尔探险军(Abor Expeditionary Force)助理政务官(Assistant Political Officer)班廷克(Arthur Harold Walter Bentinck,牛津文科硕士学历,1898年进入英印殖民政府,1933年从阿萨姆政府退休。60年代仍在世)1912年4月23日从印度的布鲁嘎通过讨伐队上司提交给印度政府外务卿的长达52页的大开本英文秘密报告内页9言,当阿波尔讨伐队的测量人员做为英印官方人员首次沿Dihong(他的报告只用此名,而不用Dihang)河上至近嘎哥时,才发现他们以前犯了一个错误,如果这个错误尚传播未广,可以纠正的话。那就是当地阿波尔人和米日人称Dihong为Siang,实际上是Tsiang(汉藏语系中有南方称江,北方称河的特点)的变音,因为阿波尔人无法发Ts-这种音。Si在当地有Po(即吐蕃的蕃,指西藏中心地区;亦有波密之意)的意思。1960年中印边界谈判时,我外交部人员将印方文献的Siang均译成西昂,看来是不妥的,因为照当地的发音应为“香”。另据1911-1913年多次从底项河逆流北上,并于1913年上半年至白马岗的英国军官董巴尔(George Duff-Sutherland Dunbar, 1878年5月29日

生,世袭贵族。1902年入英印殖民军,1907年升为上尉,1915年升为少校,1925年退休。1911—1912年参加阿波尔讨伐队,获皇家勋章。1912—1913年任布拉马普特拉调查队护卫队长。欧战时期在法国和南北边境任职,1941—1945年在印度常务部任专职)爵士所著:《诸边境》(Frontiers. 伦敦,1932年,xiii,320页;有1984年新德里影印本)一书页100言:Dihang是阿萨姆人的称呼,而阿波尔人(当地珞巴人)称做Si-ang。后人们还常用Dihang。但一般将上部称做西昂(Siang)河。而西藏方面的地名录及地图等对此毫无反映,对大拐弯以下这一段雅鲁藏布江不标名称。看来应尊重当地珞巴族的意思,名从主人,用香河这个称呼。笔者在以上近期国内诸文的基础上,参考有关汉藏及外文史料,拟作一补充性的概述。3、英文:在国外,最多的还是英文史档及各种专题研究,虽不可谓是汗牛充栋,但数量也相当可观。其中虽多有为英印侵略势力张目的,论述时不可不辨。而且英印学者均未能直接使用或接触有关大拐弯一带的清代藏汉文史料,如处理波密事务官员的奏章及游记,这就造成了极大的缺憾;为此我们有必要补足这一点。但英印史料的价值有的是别的史料所无法代替的。

地图:有关这一地区的地图部分真正经过测绘的始于1878年以后,几乎全出于西人之手。最为丰富的是光绪末至1949年的,重要的多出于英人之手。为了说明文中所涉及的地名,我们比勘了解放后国内西藏方面的地图及地名资料,并参考了近几十年来国外有关这一地区的研究论著所附地图,本应附绘几幅“近代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峡谷及下游底杭河地图”于后,以为参考,但因缺乏绘图费姑缺。

入清以来,藏族的政教势力进一步从北向南推移至大拐弯下游的西藏珞瑜地区,第五世达赖喇嘛时期更盛。在珞瑜地区的北部,入清以来,西藏地方政府已建立了隆子宗(今同名县)地方行政建置。而以东的贾隅(今隆子县加玉区)已是主巴噶举派的天下,且早在明以前就是藏人向往的杂日朝圣地所在。再往东的白马科(又写做白马贵后白马岗,即雅鲁藏布江的拐弯处所包)早在明以前就成了宁玛派的天下,波密土王在此有一定的管辖权。实际上,至1840年以前,西藏地方政府对于珞瑜地区并未实行政治管辖,与以南的英印当局更无接触。人们对该地区基本上是不太了解的。如成书于乾隆初年的《西藏志·疆圉》仅言:“西藏南至珞瑜茹巴之怒江为界。……南即珞瑜,中隔一江。珞瑜乃野人,名老卡止。嘴割数缺,涂以五色。性喜盐。其地产茜草、水竹、紫草茸。不耕不织,穴室巢居,猎牲为食。藏内有犯死罪者,人解送过江,群老卡止分而啖之。”而每至猴年赴杂日神山朝圣时要向当地的珞巴人送买路钱,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西藏解放。当时,人们对该地区及当地的珞巴族基本是不太了解的。

18世纪中期,印度逐渐沦为英国殖民地,英帝国主义遂以印度为基地,发动了第一次侵缅战争后,通过1826年的扬端波(Yandaboo)条约攫取了阿萨姆。在试行通过当地统治者管理这块新殖民地后,英国在1938—1942年间又将阿萨姆改变为英属的一个非正式的省份。从1826年起,在阿萨姆的英国官员便理解到:沿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北方的山区部落出现了特殊的行政管辖问题。尔后的十几年,即到1840年,阿萨姆的军警当局不断试图越过传统习惯线北上,特别向西藏的珞瑜地区进行侵略扩张,不过渗入的程度很浅,因为珞巴族对南来的英印势力具有较大的反抗精神。在1840年以前,历朝中国中央势力在珞瑜地区的北缘均无活动。1840年以来,较早提到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峡谷所包含的白

马岗一带的汉文史料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36页31上下,内言:“戊子,驻藏大臣满庆、帮办大臣恩庆奏:窃奴才等于本年六月初三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同治四年五月初七日奉上谕:满庆等奏:披楞(指英国)声言借路赴藏,与布鲁克巴(即不丹)构兵,现筹办理情形等因。钦此。遵查披楞边界,自西藏东南隅连界之野番珞巴及白马贵边界起,绕至正南之布鲁克巴。……其间可通西藏路道颇多,是以复咨达赖喇嘛,飭令协理事务诺们罕及噶布伦,将调派士兵认真操练情形,照实开单,呈请察核,如有未妥,以凭指示。”

1873年以来,阿萨姆当局用了几年的时间根据传统习惯线划出了一条内线,从而成为后来我方所认定的中印东段边界。

1840—1911年间,英帝以阿萨姆的军警势力为主要力量,从该邦不断北上骚扰我珞瑜地区,遭到我珞巴族人民的强烈抵抗。

1880年,印度班智达金塔普来到大拐弯峡谷,探查藏布江是否流入布拉马普特拉河,方法是按约定的时间从当地向江中投漂有记号的圆木。但因没联系上,这些圆木显然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漂入了孟加拉湾。历经千辛万苦,包括被卖为奴隶,他于1984年返回印度。他不识字,但记忆力极好。由别人记录的他的此行报告1889年印行,并附地图;后又有1915年重印本。他的报告很出名,最初很多人怀疑此报告的准确和真实性,但后来的贝利等英国人赴此地探险均拿着他的报告逐一核对,发现大多是正确的。

《藏汉大辞典》(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1610Pad-ma-bkod条解释:“白马冈。西藏自治区墨脱县旧名。”驻藏大臣《有泰奏牍》收入吴丰培先生所编:《清季筹藏奏牍》(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七年)第三册,内卷二页34—35记载:“再奴才接据察木多游击转据江卡守备禀称:巴塘所属陆玉竹瓦寺、亚海贡等处番民讹传:藏内新开有白马贡地方,天生福地,五谷自生。愚民惑于浮言,举家偕往,就彼乐土。约计男妇共千余人,相望于道。守备当派把总带领兵丁前赴南墩交界截阻。据番民声称:因本地困苦,生计维艰,不得以共谋远徙,冀以逃命等语。在途行缓,随逐水草,坚意欲赴白马贡。不听开导,非语言所能阻止等情前来。奴才查白马贡在硕板多迤南,计二十余程,本藏属极边之地,界连珞瑜野番,人迹罕到,荒野旷远,惟一高山屹然独立。夷俗崇信佛教,间有二三小民,裹粮前往,朝山礼佛,谓登极乐世界。由来已久。盖白马贡三字出自佛经,系属番语,译言极乐世界。然不过寓言劝世,教人向善。岂有不耕而食,五谷野生之理?乃巴塘番民以刻下生计维艰,聚众谋亡,藉白马贡为隐射,以遂其逋逃之愿。窃恐浮言传播,遐迩接踵而来,摇动边徼人心;因之不靖,更可虑者。该番民去无所靠,退无所归,致成失业游民,难保不滋扰生事,关系綦重,后患堪虞。且巴塘甫经剿平,善后未了,正宜乘此羁縻,未可任其流亡他徙。当经奴才一面飭令江卡、乍丫两汛守备开导,并译行商上转飭沿边番官,会同汛弁,极力阻截,勿令过境;一面飞咨督臣锡良,迅飭建昌道赵尔丰派员绕出番民之前拦阻,设法招回,遣归原牧,以安边氓而维大局。奴才为思患预防起见,是否有当?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初四日具奏。”七月初九日奉到朱批:“另有旨。钦此!”

同卷页38记载:“六月二十一日由喇嘛哑来。奉旨:有泰奏巴塘所属陆玉等处番民讹传藏内新开白马贡地方,为天生福地,男妇共千余人相率前往,转飭沿边番官,会同汛弁,极力阻截,并飞咨锡良,迅飭赵尔丰派员绕出番民之前拦阻,设法招回,遣归原牧,以安边氓等语。此事情节该番民究竟因何远徙?著锡良妥速筹办,并迅即查明实情,详细电奏。

钦此。枢号。”但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锡良遗稿》(中华书局, 1959 年)中未发现有关的回奏。

这时, 法国藏学家巴考(J. Bacot) 正在藏滇川交界地活动, 目睹了这一迁徙。他所著《西藏叛乱者向乃白玛科, 藏人的希望之乡》(Le Tibet Revolte vers Nepemako, La Terre Promise Tibetain. 巴黎, 1912 年) 一书记载: 八世纪时莲花生据说访问了乃白玛科, 从而使这里成了西藏(宁玛派) 佛教徒向往的圣地(页 10- 11)。他还说明该地在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页 131)。

美国藏学家威利(Turrell W. Wylie. 1928- 1987 年在世) 译注的《西藏地理. 据瞻部洲广说》(The geography of Tibet, according to the ' dzam- gling- rgyas- bshad. 罗马, 1962 年), 原作者敏珠尔呼图克图(1789- 1838 年在世) 是青海人, 大通县广惠寺活佛, 1799 年驻京, 卒于京。其《瞻部洲广说》是部世界地理著作, 成于 1820 年, 较全面地叙述了整个藏区的宗教地理。内页 98 谈到了妙地大 gNas- Padma- bkod 为乌坚白玛(莲花生) 隐密河谷。藏文 gNas 有福地之意。白玛意为莲花。bkod 有布局意, 佛书译作庄严。该书仅称雅鲁藏布江为“藏布(gTsang- po)”。在这一地区亦不例外。

康区人民向白马科地区的迁徙进一步使珞渝地区摆脱了封闭的状况, 加强了外来藏族与当地珞巴族的联系。

宣统三年, 驻藏及川边清朝军队从两路平定波密土王的叛乱, 也首次来到了该土王所辖的白马科地区的北部。驻藏大臣手下当时设左右两参赞, 官级仅次于该大臣。负责波密之役的是左参赞罗长禔, 他于七月上旬呈报驻藏大臣, 言师次东九(今林芝县东久区), 探闻波密总管白玛策翁逃赴白马杠野番境内, 当经檄调马一管带张鸿升、步二后队官时景棠由德摩(今林芝县德木乡) 取道披多雄(今米林县派区驻地多雄村) 攻入野番境内, 为兜拿该逆之计, 并派羌纳(今米林县一乡名) 寺僧官札喜泽忍携带告示, 先往开导野番, 许以重赏, 令其献出逆酋。据该管带等驰报, 闰六月十八日由披多雄前进, 道路崎岖, 牛马不能通过, 粮食子弹皆系雇夫背运, 进至笨(应在东南不远处), 遇僧官札喜泽忍押解岳通(今墨脱县月尔冬村) 兵头目泥喜等来见。讯据泥喜供称, 波密总管自到仁进邦(波密军用略图标在金珠村〔今墨脱县金珠区驻地格当乡〕西南), 即传谕岳通地方严守隘口, 布置药箭、药签, 抵抗大兵, 在哈买(应为波密军用略图所标哈布, 在金珠西部) 一带建造兵屋, 并已调集珞巴兵丁百余名把守阿衣八宗(波密军用略图标在岳通之南) 桥梁等处。并据供称, 岳通旧营官夺补深明大义, 不肯助逆。管带等当令泥喜亲写信函, 力劝夺补去逆效顺, 并给发参赞告示, 派人递送去讫, 一面拨队押同泥喜等前进。二十四日抵阿衣八宗, 桥梁未毁, 番兵已逃, 炊食之灶, 余火犹存。我军渡河前进, 于二十五日午后抵岳通, 营官夺补迎降, 探知波密总管闻大兵追至, 已由东波八桑桥南窜, 管带急悬重赏, 购眼线, 派时队官带兵追拿, 是夜赶至觉木曲宗, 该总管已由仁进邦业巴蒲冲与夺补合谋杀毙。时队官等割取首级。白马杠所属八部, 其七部均已归顺, 惟曾曲一部未降, 访闻逆酋之妇尚匿其地, 仍应剿办。参赞调兵由披多削(雄) 攻入珞夷, 前后兜剿, 野人望风归顺。该军驻其国都, 即仁进邦神山。

也就是在上述 1911 年阴历七月, 该罗长禔向驻藏大臣联豫呈上了波密军用略图, 其“绘呈地图详”(摺) 片内言: “窃照波密地方, 表里山河, 自成部落, 实用武之国也。……

参赞军行所至,考其山川,计其道里,绘有军用略图。属以大难初平,伏莽未销旅行,详测俟诸异日。现当设官建置,分兵驻防。览此图者,亦可得其梗概焉。理合详祈鉴赐,核咨备案施行。”^① 但此图显然仍属中国的传统旧式地图,没有使用近代西方的测绘技术。不过做为一张实测的军用地图,则是中国人所绘首张大拐弯地区最详细精确的地图了。

一个人如对今日的中印东段边界史作一探讨就会发现:印度方面继承了英帝殖民者的衣钵,以所谓的“麦线”(即原印度非法占领的“印度东北边境特区”的北界)为中印东段边界,而我方自宣统年以来逐步确定了以非法的“印度东北边境特区”的南界为中印东段边界。实际上“印度东北边境特区”的南界是英印方面确定的与阿萨姆邦的分界线,我方历史上限于条件从未对这条边界线作过勘定,所以只好以此为界以为日后与英印方面谈判地步,自民国年间到目前,我国的地图都是这样画的。

英国人威廉逊(Noel Williamson)是英国侵略中印东段边界地区的急先锋。他代表的一种倾向认为:此前英国政府一般不许其臣民北越“内线”(即中印东段边界),除非那里的部落人杀了入境的英国臣民;这种政策应当改变。界南的阿萨姆通过掠夺界北的森林资源及在那里种植茶叶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英印殖民政府不断承受着这种压力。1905年,威廉逊取代了任职达二十三年之久的号称处理界北部落事务的无冕之王的尼达姆(Jack Francis Needham, 1842年12月14日生, 1867年从政, 1882年任萨地亚助理政务官。因其对大拐弯下游地区的考察, 1887年获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吉尔[Gill]纪念章。晚年住在阿萨姆首府西隆。1924年11月11日去世),出任助理政务官,驻扎萨地亚。当然威廉逊同英印殖民政府一样,并不视“内线”(即中印东段边界)为印藏的边界线,而是作为阿萨姆与部落地区的分界线。1907年11月至1908年1月,他沿洛希特河而上到了今下察隅地区瓦弄,他认为这是西藏的边界所在。^② 1908-1909年冬,他又受珞渝的阿波尔人的Kebang(格邦村,位于东经95.0,北纬28.2处的底杭河西岸。此地名不见于《西藏自治区地名录》)头人之邀以私人身分访问了该村,陪同他的有陆姆斯丹(Dugald M' Tavis Lumsden)上校和精通阿波尔语的美国基督教内地会牧师杰克曼(W. L. B. Jackman)。^③ 1909-1910年冬,他又沿洛希特河而上,这次他会见了日马的首要藏官并与之作了交谈。

1911年3月21日,威廉逊在珞渝的Komsing(空心村,东经95.0,北纬28.3处的底杭河东岸。此地名不见于《西藏自治区地名录》)被尾随而来的附近Rotung(若通村,东经95.2,北纬28.2处的底杭河南岸。此地名亦不见于《西藏自治区地名录》)和格邦村民杀死,于是阿萨姆军警借机派出了阿波尔讨伐团,直接沿底杭河北上追捕这些村民;另外还派出了米什米和米日(僮人〔一说为珞巴〕的一支)探查团,前者直接针对我下察隅地区,

① 所引图文见罗长禔之子罗春驭所辑其父的文稿《泣血缙存》(民国初年自印本),卷2,页10下-13上。

② 见其《1907年11月至1908年1月阿萨姆与东南西藏间的洛希特-布拉马普特拉》(The Lohit - Brahmaputra between Assam and South-Eastern Tibet, November 1907 to January 1908),载《地理杂志》(Geographical Journal), 1909年,卷34,页363-383。此文论述了阿萨姆与西藏的贸易,回顾了此前西方人对该地区的探险及清政府对西藏的管辖。文后附有路线地图。

③ 见陆姆斯丹与威廉逊合撰的《1909年阿波尔地一游》(A journey into the Abor country, 1909),载《地理杂志》1911年,卷37,页621-629。此文主要据陆姆斯丹的日记。文后附有路线地图。

后者直接针对我阿波尔以东偏南的珞渝地区。时间为 1911—1912 年间。关于这三个讨伐探查团的大概情况见英国随军记者哈密尔顿(Angus Hamilton, 1874—1913 年, 此人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 所著《在阿波尔丛林》(In Abor jungles, being an account of the Abor expedition the Mishmi mission and the Miri mission. 伦敦, 1912 年) 一书。书后附有一幅较详细的地图, 增加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实际上, 按照当时的军事规定, 哈氏被禁止随军, 所以他只好在界外搜集资料, 此前曾游历过下察隅地区, 此次又随军的贝利讥其只好用一大堆道听途说来满足与他签了合同的书商及读者, 而且叙述有不准确之处。^① 但实际上该书的内容仍是十分有史料价值的。当然, 我们从英国翻拍回来的英国档案所收率领阿波尔探查团的军警首领的报告则更详细了, 但这些档案分散而某些内容过细, 且我国一般人很难见到, 所以哈氏此书就显得简约明了了, 当然, 他的书我国一般人同样很难见到。

1912—1949 年间这一时期是我中印东段边界的多事之秋, 1912—1913 年间, 印度阿萨姆当局非法将我们隅、珞渝和下察隅三地区分成西、中、东三段, 委派了各自的行政长官。1919 年, 印度又非法划改中段和西段为萨地亚边境特区。

1913 年 10 月, 由英国策划在印度北部的西姆拉召开了一次所谓“中英藏三方会议”(即西姆拉会议), 英国代表麦克马洪爵士(Sir [Arthur] Henry McMahon, 1862—1949 年在世, 时任印度殖民政府外务大臣) 在西姆拉会议之外背着中国政府的代表, 于 1914 年 3 月 24 日, 在德里同西藏地方当局的代表, 用秘密换文的方式, 划出了一条以藏族势力边缘为特点的沿着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脊的总长稍稍超过 1126.3 公里(7 百英里) 的所谓“麦线”(该线以后是有些变化的, 因为英印方面不断因各种原因对该线的具体走向加以确定, 并不断试图向北推移。所以该线究竟在什么地方是有争论的, 如六十年代之交我国多次指控印方在该线以北非法建立了一些据点), 以后即以此为中印东段边界, 企图把 9 万平方公里(英印方面言约 3 万 2 千平方英里, 合 82880 平方公里, 与我方所说相差约 7120 平方公里) 的上述三地区划归英属印度, 历届中国政府都不承认这条非法的“麦线”。该线从东向西经墨脱县的蒙哥和珞渝的哥布之间穿过。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 英印当局基本无暇顾及我珞渝地区。^② 而后, 英军进一步加剧了对我珞渝地区的侵略。

1943 年英帝在我门隅、珞渝和下察隅三地区非法成立了所谓的“东北边境特区”(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 简称 NEFA)。

英藏对珞渝地区的争端起源于 1913—1914 年间的西姆拉会议, 当时英方特命全权代表麦克马洪诱使藏方特命全权代表夏札同意以沿喜马拉雅山脉为新的英藏边界, 而当时是沿着平原的。1914 年 3 月夏札与麦克马洪的交换信件非法接受了这一边界, 此即后来举世皆知的非法的“麦线”。^③ 夏札明目张胆地出卖西藏领土不过是为了让英帝国主义支

① 见其《无护照至西藏》(No Passport to Tibet. 伦敦, 1957 年) 一书, 页 29。

② 伍德曼(Dorothy Woodman) 女士:《喜马拉雅边界》(Himalayan frontiers, a political review of British, Chinese, Indian and Russian rivalries. 美国, 1969 年), 页 138。

③ 当时英藏的非法协议特别指出藏人可自由赴新界以南的重要朝圣点。历届中央政府均否认西姆拉会议的决定, 包括所谓的“麦线”。我国解放后的地图均以传统边界为据。

持其幻想的西藏“独立”。

而后, 珞渝地区的管辖情况照旧, 英藏双方均未介意。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从印度平原进入珞渝地区的交通不便使英印当局还顾不上去品味这块西藏当局送来的肥肉, 他们既未向该地区派赴行政官员, 也未从事测量或刊布西姆拉协议的文本, 甚至未授权印度测量局在地图上标出这一更改的“边界”。

英印当局逐渐忘记了 1914 年的西姆拉协议, 1935 年英方负责英藏关系的最高长官, 即驻锡金行政长官和阿萨姆总督这两位最有关系的英国官员均不知道还有一条“麦线”。

1923 年, 花德金获英印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允许, 去大拐弯峡谷考察, 1924 年, 他由考道尔勋爵(Lord John Duncan Vaughan Campbell Cawdor. 1900 年 5 月 17 日生, 世袭贵族) 陪同, 从大吉岭至江孜, 然后至大拐弯峡谷, 从 1915 年贝利抵达的最低点, 到了 Payi. 后经达旺和东部不丹返印度。他的《藏布诸峡谷之谜》(The Riddle of the Tsangpo Gorges. 伦敦, 1926 年, xv, 328 页, 附一幅地图) 详细记载了此行。

1928 年, 他又从下察隅的杜莱曲至底杭河做了考察, 并在 1928—1929 年伦敦的《园艺家年鉴》(Gardeners' Chronicle) 连载了关于此行的报告。

贝利 1882 年生, 从皇家军事学院毕业后, 1900 年加入英印军队, 参加了 1903—1904 年的侵藏英军。1913 年首次入藏布峡谷考察, 成果斐然。1916—1938 年他在印度任政务官。1967 年去世, 享年 85 岁。

下面我们谈一下 1927 年来西藏地方政府平定波密土王之乱后在珞渝地区的设置:

在该地区, 西藏地方政府的行政组织虽不如在门隅地区那样完备, 但是仍然在许多地方建立了行政机构, 并委派官员进行管理。珞渝地区原属西藏波密管辖。1927 年西藏地方政府平定了波密土王的叛乱后, 曾经在德东设宗(以后宗政府迁至墨脱), 管辖白马岗地方。同时将全区划为五个“错”, 即当布错、撒卡错、胡惹错、背崩错、达岗错, 并委派了“错本”和“校本”等行政官员。尔后西藏地方政府公文提到的“五错六寺”即此五错。其中的达岗错, 就位于“麦线”之南、昔勒帕抵河以北。达岗错以南则设有“校本”等行政长官。

在阿萨姆政府的文献中, 该波密土王名写作 Tebu(第巴?) Dendun. 他于 1928 年 12 月逃至阿萨姆邦的萨地亚。追击他的藏军越过了“麦线”。^① 令人不解的是, 英印当局并未利用该土王大作文章, 而是将其置于类似监禁的状况, 以至他于 1931 年又逃离了萨地亚, 北返珞渝的许木(英方地图作 Simong. 我方地图作许木, 《地名录》作西布, 位于东经 95. 2, 北纬 28. 3 处) 阿波尔人地区, 试图寻求他们的支持, 同年死在那里。但他的追随者们借助许木阿波尔人的支持骚扰北边白马科及波密的藏军, 故平定波密的一部分藏军南下雅鲁藏布江(英文地图作 Siang 河, 指上部阿波尔人居住的这一段), 讨伐了这里沿江的嘎哥(位于东经 95. 0, 北纬 28. 5 处)、日嘎(位于东经 95. 0, 北纬 28. 4 处) 及多姆辛(Domsing. 疑为英文地图的 Komsing. 位于日嘎以南) 阿波尔人村庄。其中一些藏军到达了研帮(Yembang. 在我境内的西昂河与锡约尔〔英文地图作 Siyom〕河交汇处以南) 这一 1928 年

^① 兰姆:《西藏、中国和印度, 1914—1950 年》(Tibet, China & India, 1914—1950. 英国, 1989 年), 页 411 言即不列颠外线。

未建立的英国警察哨站几里处。^① 由于阿波尔人的抵抗,藏军于1932年3月北撤。当时任萨地亚边区的行政长官傅尔泽(T. E. Furze)对此有所注意,他欲派兵北上日嘎,但阿萨姆政府因财政问题未予批准。^② 伦敦的印度事务部档案甚至没有此次波密事件的专门卷宗,只在驻甘托克锡金行政长官的报告中提及了此事。^③

这以后,有以下三位英国植物学家赴大拐弯峡谷探险:

1、陆德陋,1908年毕业于剑桥,获理工学士学位。曾从多次来藏的植物学家花德金之父学植物学。离开大学后任巴基斯坦卡拉齐的信德学院副院长,同时任生物学教授和英语讲师。他不仅是位突出的自然学者,而且在英国文学上造诣极深,特别喜爱诗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任印度教育部欧洲诸学校的学监。1922年,德里要求为将在江孜开办的英语学校选一校长,为期三年,他毛遂自荐。1923年江孜学校开办,1926年关闭后,他于1927年至克什米尔的斯里那噶。1934年,他与谢里夫等赴达旺。1938年,俩人又赴藏布峡谷搜集植物标本达10个月。陆氏返回克什米尔后,于1940年被任命为拉达克联合委员,直到被任命为驻锡金政务官增补助理。1942年初被派赴拉萨,1942年4月-1943年4月任驻拉萨使团代表。劝说西藏地方政府让援华物资从印度经西藏进入内地,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陆氏在拉萨太忙了,又没有妻子陪伴,心力交瘁。所以当谢氏接替他时毫无遗憾地离去了。1946年,俩人又赴波密大拐弯峡谷地区搜集植物标本,一直到翌年7月。1972年3月27日去世,终年86岁。他与谢氏的生平及在大拐弯峡谷考察的情况、照片和地图见弗莱彻(H. R. Fletcher)著:《找花,陆德陋与谢里夫的植物考察,据日记及其他有关书面资料》(A quest of flowers. The Plant Explorations of Frank Ludlow and George Sherrieff told from the diaries and other occasional writings. introduction by Sir George Taylor〔泰勒尔爵士撰导言〕,FRS. 爱丁堡,1976年)。

2、谢里夫少校(Major. 1898-1967年9月19日在世),1943年4月-1945年5月任驻拉萨使团(因心脏不好被迫离去)。谢里夫是1942年11月3日结婚,携妻Betty赴拉萨上任的,《找花》一书页227-246有其妻所撰拉萨回忆录。此前谢氏被驻锡金政务官顾德从军队要来在甘托克和噶伦堡组织西藏的羊毛贸易。上任前曾赴德里接受印度总督林力特苟勋爵的指示。夫妇俩1943年3月13日从甘托克动身,在江孜受到了印度政务部的塞克尔(江孜商务代办)等人的欢迎。4月1日已在从江孜赴拉萨的路上,于4月9日这个与西藏地方政府商定的吉日抵拉萨,迎接他们的是陆德陋等,尔后住在德吉林卡。在拉萨期间,谢氏曾一度短期赴印度,是黎吉生来接替的。

3、泰勒尔爵士,1904年2月15日生,1926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获科学士学位及植

① 印度事务部档案,12/3111,1928年9月14日阿萨姆政府致印度政府信。

② 印度事务部档案,12/3111,1930年12月10日阿萨姆政府致印度政府信。

③ 唯有瑞德爵士(Sir Robert Niel Reid. 1883年7月15日生。1906年牛津毕业,翌年开始在孟加拉殖民政府任职,1936年被封为爵士)《1883-1941年间毗邻阿萨姆边境地区史》(History of the frontier areas bordering on Assam from 1883-1941. Shillong. 1941年),页257-258根据阿萨姆政府的档案透露了上述情况。《西藏文史资料选辑》(西藏政协,1984年,第3辑)收有两篇参与此事的西藏官员的回忆录,即江巴悦西的《西藏噶厦政府与波密噶朗部落之间的纠纷》及拉乌达热·土丹旦达的《波密地区情况简介》,但两文所述波密土王出逃至死这段情况因得之传闻,故与瑞德不符。

物学荣誉一等奖。在非洲进行了多年的植物考察后,1937年(一说为翌年)赴藏东南藏布峡谷地区及不丹进行植物学考察。1956年任英国皇家植物园园长。1962年被封为爵士。他1937年所摄两幅南迦巴瓦峰一带大拐弯峡谷的照片(保存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收入阿兰(Charles Allen)著:《西藏一山,探寻凯勒斯山和印度诸大河之源》(A Mountain in Tibet. The Search for Mount Kailas and the Sources of the Great Rivers of India. 伦敦,1982年)一书页151及152。他的《藏东南植物采集》(Plant Collecting in South-east Tibet)一文连载于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杂志》(Journal, Royal Horticultural Soc.)卷72第一部分页130-144及第二部分页166-177。

下面我们谈一下1946-1947年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在西昂河流域与英军的抗衡:

英文史档谈到在1946年初西藏地方政府负责珞瑜地区西昂河流域的为Tempo官员或称Tempo第巴札希顿珠,Tempo或Tampo为“麦线”以北一村名,又称Ter宗。马尔贝所编华德金探险地图(Exploration in The Eastern Himalayas and the river gorge country of Southeastern Tibet. - Francis [Frank] Kingdon Ward (1885-1958) -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with a map of the area of his expeditions. compiled by H. Schweinfurth - Marby, 1971-1974)作位于北纬30.3,东经94.9的Tongbe Dz.位于今波密县易贡错西端北部。今西藏九幅大张地图此地已无此地名,附近周围为地名空白。从北向南流经珞瑜地区的雅鲁藏布江可一分为二,北段在英文史档中称作Siang河,南段称作Dihang河。札希顿珠告知英国西昂流域分区助理政务官(Assistant Political Officer, Siang Valley Sub-Agency)詹姆斯(P. L. S. James),他要到嘎哥和许木相当下面的一地去执行公务,詹姆斯马上上至西昂河的阿波尔人居住地Pango(邦勾,《西藏自治区地名录》无此地名,西藏九幅大张地图标于北纬28.8,东经94.7处)去会见,英文史档言札希顿珠名Ter Dzong.可能有将宗名误作人名处。邦勾在嘎哥北30英里,“麦线”南约20英里。詹氏言德尔宗带有300属下,多带刀,有的带有前装鹿角叉的旧式滑膛枪。詹氏无理要求德尔宗返回西藏,这样在此年2月中,一场边界战争爆发在即,尽管詹氏所率阿萨姆来福枪队人多火力强,德尔宗还是正告詹氏明年将再来,然后德尔宗在邦勾至“麦线”间征了税和劳力。

德尔宗的行动引起了萨地亚边区(Sadiya Frontier Tract)政务官瓦尔克(G. E. D. Walker)的惊慌,他禀请阿萨姆政府于1947年初将英国的占领从嘎哥和许木北上推至“麦线”南约10英里处西昂河两岸的Tuting(在西昂河西岸,西藏九幅大张地图作标于北纬29.0,东经94.8处的都登)和Jido(在西昂河东岸,同地图作标于北纬29.9,东经94.9处的阿米吉刀),这就需要沿交通线设置一些补给哨站。瓦氏建议,每一哨站至少要配一排用自动武器装备的阿萨姆来福枪队。^①阿萨姆政府同意这一行动,不再让德尔宗南下“麦线”,但要稍等一段时间。^②这样在1947年,英国的占领仍北至嘎哥和许木。

1947年1月,驻守嘎哥的阿萨姆来福枪队队长听说两藏官率不下一千名的武装属天下至“麦线”,要收税至德尔宗主张为西藏南界的嘎哥和许木。阿萨姆政府对这一情报

① 印度事务部档案,12/2413,1946年4月4日瓦尔克的纪要。

② 印度事务部档案,12/2413,1946年4月15日阿萨姆政府秘书高德夫瑞(R. W. Godfrey)致印度政府的信。

表示怀疑,认为如用武力阻挡,将限至上年阻挡德尔宗处的邦勾以南。将藏人限制至“麦线”尚不可能,因为英国的侵略管理体系还未到达。^①印度政府对此表示支持,甚至建议动用飞机用作侦察和恐吓。^②

詹姆斯也急忙率一小股来福枪队沿西昂河而上,于1947年2月17日在邦勾北约15英里的都登与德尔宗及一行相会。^③德尔宗一行不如所说的多,但比上一年的人数多。德尔宗宣布他仍是下至嘎哥和许木收税,要求允许通过。詹氏如去年一样顽固阻挡;3月4日,因给养问题,所有的藏人均北返越“麦线”。^④这次德尔宗未能来得及向上一年一样收税后再撤。^⑤德尔宗的上司是拉萨色拉寺。

下面我们谈一下中印东段边界在底杭河段的具体走向:

1873年英方的《孟加拉东部边疆条例》创立了所谓的“内线”,即阿萨姆邦与我门隅、珞渝和下察隅三地区的分界,1914年“麦线”划定后,我方就以“内线”为中印东段边界,其具体走向在1960年的中印边界谈判中由我方作了以下说明:东段边界的传统习惯线的绝大部分——从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界处(约在东经91度30分,北纬26度53分)起往东,到大约东经93度47分,北纬27度1分处,再折向东北到传统习惯线北侧的尼杂木哈特附近——大体上一直是沿着喜马拉雅山南麓和布拉马普特拉河北岸平原交接线而行的。

在东段起点和尼杂木哈特之间,约在东经92度7分,北纬26度52分处穿过鲍罗里河;约在东经93度58分,北纬27度20分处穿过朗加河;约在东经95度19分,北纬28度5分处,即巴昔卡东北,穿过雅鲁藏布江;约在东经95度40分,北纬28度15分处穿过丹巴河。……

除上述文字说明外,我方还提交了一幅“中国西南边疆图”(比例尺为五百万分之一)。这幅地图标名明了上述中印传统习惯线的位置和地形。以上均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和印度政府官员关于边界问题的报告》(1961年3月,亦有英文本),中文,中方部分页3。

但上引《世界第一大峡谷谁属——地貌学家杨逸畴教授答记者问》一文第16页则说:“大峡谷从进口的派区到出国境的巴昔卡。”而科学探险家协会的《世界最大峡谷及其命名》一文第1面则说的更明确了:“(大峡谷)到墨脱县我国国境线上的巴昔卡……自古以来,作为我国神圣领土国境线的划分通过墨脱县巴昔卡的地方,……中国政府和人民从来就把巴昔卡定位在中印国境线上,所有的地图上也从来就是这样标定的(注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图,1:250万》国家测绘局出版,1982年),此不容置疑和来不得半点含糊。……我们世界最大峡谷的长度,其末端止于国境线的巴昔卡,除了它绝对的真实性和科学性之外,是充分考虑到它的作为中国神圣领土的独立性和完整性的。”但国境线是在“巴

① 印度事务部档案,12/2413,1947年1月8日阿萨姆政府致印度政府的信。

② 印度事务部档案,12/2413,1947年2月1日外交部备忘录。

③ 都登和吉刀间有一绳桥可通。

④ 印度事务部档案,12/2413,1947年2月21日、3月4日、6日阿萨姆政府致印度政府的信。

⑤ 印度事务部档案,12/2413,1947年6月30日截止的阿萨姆政府部族地区顾问米尔斯(J. P. Mills)关于此年阿萨姆部族地区的报告。

昔卡东北,穿过雅鲁藏布江”,巴昔卡不在国境线上,而是在我国境内,西藏自治区测绘局1978年1月出版的九幅中文大地图明确标明,巴昔卡在从西南方北上的国境线西部我方处。对照藏文地图亦同。上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和印度政府官员关于边界问题的报告》印方部分页39-40也记载:1960年中印谈判时,印方提问:“中国方面的叙述提到,这条线(边界)在巴昔卡附近跨过雅鲁藏布江。但是地图表明,边界线是通过巴昔卡的。对这个矛盾,我们希望得到澄清。”中方已明确回答:“边界线在巴昔卡东北,约东经 $95^{\circ}19'$,北纬 $28^{\circ}05'$ 处跨过雅鲁藏布江。”

下面我们谈一下“麦克马洪线”的具体走向:

1914年“麦线”划定时,还只是地图上的一条红线,其具体走向涉及雅鲁藏布江处在1960年的中印边界谈判中由印方作了以下说明:(从西向东)边界……朝东北方向穿过顿加山口(约为东经 $94^{\circ}10'$,北纬 $28^{\circ}59'$)。然后边界往东行,穿过迪亨河,上升到西藏境内的金多河和聿多河同印度境内的丹巴河及其支流之间的分水岭。

下面我们谈一下1950年以后的中印东段边界涉及雅鲁藏布江处:

1947年印度独立,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印度坚持继承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扩张政策,在1950年阻挠我和平解放西藏未逞之后,于1953年前后大举向非法的“麦线”推进,完全侵占了门隅、珞渝和下察隅三地区。1954年在上述三地区再次非法确立自1943年就已成立了的所谓的“东北边境特区”。

西藏解放后,中国为了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中国的边防部队并未向印军占领的原属中国领土的传统习惯线以内派出部队,而是派驻到“麦线”的附近,形成了一条实际控制线。

1959年,印度政府乘我西藏少数上层人士叛乱之机,要求我国承认印度对上述三地区的占领是合法的。我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这段边界问题,而印度政府却在1959年至1962年间多次挑起武装冲突,企图使用武力实现它的领土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和印度共和国总理于1960年4月19日至25日在德里进行了会晤,商谈中印两国政府之间所发生的有关边境地区的某些分歧,其中中印东段边界是两大重点之一。两国总理充分说明了两国政府的各自立场,从而对两国政府的观点有了更好的了解。但是,这些会谈没有取得解决当时分歧的结果。两国总理决定,双方政府的官员应该对两国政府所占有的、支持它们立场的事实材料进行审查。

两国总理在会议结束时于同月25日发表的联合公报体现了他们的决定,并且成为对负责进行两国总理所规定的审查工作的官员小组的大体指示。联合公报除其他问题外,提到:

“因此,两国总理同意,两国政府的官员应该会晤、审查、核对和研究各方用以支持其立场的有关边界问题的一切历史文件、记录、记述、地图和其他资料,并且拟出报告递交两国政府。这个报告将罗列一致的各点、不一致的各点或者需要更充分审查和澄清的各点。这个报告应该有助于两国政府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考虑。”

第三次亦即最后一次会晤11月7日在仰光开始,经过十次会议后于12月12日结束,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和印度政府官员关于边界问题的报告》(亦有英文本)。

今日的中印东段边界全在西藏自治区对印边界线上,西起中、印、不(丹)三国交界处,

沿着喜马拉雅山脉而行,东至中、印、缅三国交界处,长 650 公里。这段边界又称传统习惯线,英方称之为“内线”,从未正式划定过。以北的西藏一侧从西向东分别为门隅、珞渝和下察隅三地区,大致分属西藏的错那、(实际上还包括朗县南部)墨脱和察隅三县,一道非法的“麦线”将三县与三地区隔开。目前国内最详细、最全面的西藏地图是我国有关测绘部门(即这时已恢复的西藏测绘局的前身)1978 年 1 月内部发行的百万分之一的九幅拼接的藏汉对照两套式,其中印东段边界按有关边界条约(议定书)附图标绘,行政区划资料截止 1977 年底。该图未标出非法的“麦线”,而是以两条大致南北走向的河流为界,将非法的“麦线”以南的门隅、珞渝和下察隅三地区一分为三,在分县图各县异色的原则处理上与错那、墨脱和察隅三县分别显示同一分县色;但这与门隅、珞渝和下察隅三地区的分界并不完全吻合。所以从该图,我们无法看出门隅、珞渝和下察隅三地区的划分。该图所收地名与西藏测绘局及军队同时内部出版的《西藏自治区地名录》基本吻合,可以参看。该《地名录》分甲种本与乙种本两种,甲种本按汉文音序排列,乙种本按分县排列,均标经纬度。其处理原则是印度实际占领区的北界即非法的“麦线”,以南的为门隅、珞渝和下察隅三地区。

1962 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决心要以武力取得他主张的边界线,下令要以武力把中国所有边防哨所消灭掉,于是同年 10 月至 11 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上述三地区全线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我边防部队迫不得以进行自卫还击。但是,根据中国政府主张的不以武力改变边界现状的原则,周恩来总理在发生冲突后的第四天,即提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三点建议:一、双方确认边界问题必须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前,双方尊重在整个边界上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军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 20 公里,脱离接触;二、印度如同意,中国政府愿把边界东段的中国部队撤退到原来的实际控制线以北,中、西段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三、中印两国总理再次举行会谈。印度政府对此建议置之不理,而且成立了战时内阁,准备继续作战。对此,中国政府决定,为了表示中国主张的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在印度拒绝上述建议下,中国单方面执行建议。在将进攻的印军击败,收复了传统习惯线以北的大部分中国领土的情况下。同年 11 月 22 日 8 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上述三地区全线停火,在中印边界东段主动将中国边防部队后撤到反击战开始时的实际控制线以北,并从此条线后撤 20 公里,并分批释放被俘人员,交还全部被缴获的印军武器。停止巡逻,同时警告印方如果再挑衅,中国保留自卫反击的权利。

中国政府作此重大的宣布与行动,使世界各国及人民都极为震动。因为自古以来,在世界各国间发生边界冲突中,一国已收回了自己主权的领土,从来没有退出到冲突发生前的地位再来进行谈判的。中国这一行动,充分证明了中国政府主张的不以武力改变现状,而要以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从而使世界各国确信中国政府政策的真实性,获得了中国说话算数的信誉。但是却给尼赫鲁和印度政府极大的错觉,认为中国政府这一行动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作法,谈判就是要印度订“城下之盟”,是一种污辱,对印度国家和尼赫鲁本人的自尊心的伤害。

1971 年非法的东北地区重组行动于同年 12 月 21 日经(印度)议会非法通过,提议将所谓的“印度东北边境特区”改为“阿鲁那恰尔邦”(Arunachal Pradesh),但考虑到这样明目张胆地吞并中国的领土太露骨,所以最后定名为中央直辖区。此新的美其名曰“联合领

土”(Union Territory)于1972年1月20日由总理甘地夫人主持了创设仪式。

“阿鲁那恰尔邦”的管理由“联合领土”的代理或副总督(Lieutenant-Governor of the Territory)负责。区的管理由以前称作政务官、现在称作代理委员(Deputy Commissioners)负责。为首的总督下由一主要秘书协助,其下有财政、供给和运输、司法、计划和发展及总管理和教育五秘书。还有教育、情报和公共关系、研究及农业诸主任。设一主任森林监督官。当新的首府伊塔纳噶尔(Itanagar)在建设过程中时,一些官员还在西隆(Shillong)办公。1974年4月20日,当时的印度总统吉里(V. V. Giri)为新首府主持了落成仪式。

巴昔卡、阿龙、德苏及邦迪拉按人口的多少为“阿鲁那恰尔邦”四大重镇。

“阿鲁那恰尔邦”分为五个区(district),雅鲁藏布江流经的为西昂区(Siang),10.9万人;首府阿龙(Along),4920人。该区还有一镇名巴昔卡(Pasighat),17780人。以上为1961年的统计。该邦总人口的男女比例为1000:861。1961年的识字率为11.29%。以上人口统计只计“阿鲁那恰尔邦”的当地部族人口,不计外来的行政及军警。该邦不同的地区讲着不同的方言,但阿萨姆语是诸部族间交往的混合语(Lingua franca)。^①

前些年,中印两国重开了边界谈判,但是印度方面只要求中国作单方面让步,拒绝采取“互谅互让”的原则。1986年12月8日和9日,印度议会通过一项法案,正式将所谓的“阿鲁那恰尔”中央直辖区升格为“邦”,并于1987年2月20日正式非法成立为所谓的“阿鲁那恰尔邦”,企图把殖民主义者炮制的非法的“麦线”强加给中国人民,使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和两国关系的改善增加了新的困难。由于印度政局的变化,前几年,中印边界谈判有了新的转机。尽管当前的印度领导人妄控中国对印度有领土野心,使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但在中印东段边界问题上目前这种维持现状的做法短时期不会有什么变化,通过以上对这段边界历史的分析,读者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历史虽会出现逆流,但边界地区的开放是必然的趋势,前些年,中国西藏有意在这一段沿边县和口岸开辟了边境贸易区和对外经济开发区,对与印度的贸易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西藏沿边地区正在以边境贸易为突破口,加速沿边地区的开发和开放,振兴沿边地区经济。这是中印东段边界发展的一种新形势。

参考文献

1. Arthur Swinson, Beyond the Frontiers. the biography of Colonel F. M. Bailey explorer and special agent. [M] Hutchinson of London, 1971.
2. Frederick Marshman Bailey, ヒスラヤの河. [M] 东京, 1968.
3. Francis Kindon Ward, Plant Hunting on the Edge of the World. [M] London, 1930.
4. Christoph von Fürer Haimendorf, Ethnographic Notes on the Tribes of the Subansiri Region. Shillong, 1947.
5. ibid. Exploration in the Eastern Himalayas. Tour diaries of travel in the Subansiri region 1944 and 1945, Shillong, 1947.

① 耐尔(P. Thankappan Nair):《阿鲁那恰尔邦诸部族》(Tribes of Arunachal Pradesh. 印度, 1985年), 页2。